

同济·欧洲文化丛书

孙周兴
冯俊 主编



本源与意义

前期海德格尔与现象学研究

梁家荣 著

孙周兴 冯俊 主编

同济·欧洲文化丛书

本源与意义

前期海德格尔与现象学研究

梁家荣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源与意义:前期海德格尔与现象学研究 / 梁家荣
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同济·欧洲文化丛书)

ISBN 978-7-100-10665-8

I. ①本… II. ①梁… III. ①海德格尔, M. (1889~
1976)—现象学—文集 IV. ①B516.54-53 ②B8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155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本源与意义

前期海德格尔与现象学研究

梁家荣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665-8

2015年1月第1版 开本 890×1240 1/32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2

定价:35.00元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王庆节(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 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
| 司徒立(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 叶廷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
| 许 钧(南京大学教授) | 关子尹(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
|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尚 杰(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
| 李秋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张再林(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
| 张异宾(南京大学教授) | 张志扬(海南大学教授) |
| 张祥龙(山东大学教授) | 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
| 庞学铨(浙江大学教授) | 俞吾金(复旦大学教授) |
| 倪梁康(中山大学教授) | 韩水法(北京大学教授) |
| 靳希平(北京大学教授) | 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周家伦

主 编:孙周兴 冯 俊

主 编 助 理:张振华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雪梅	叶 隽	刘日明	孙周兴	孙宜学	冯 俊	冯晓虎
李乐曾	陆兴华	吴建广	陈家琪	张永胜	彼特·特拉夫尼	
柯小刚	林子淳	单晓光	杨 烨	杨熙楠	黄凤祝	郑春荣
赵 劲	赵旭东	徐卫翔	胡春春	谢志斌	韩 潮	梁家荣

总 序

同济大学外国哲学学科初创于2003年,先设硕士点,两年后获批博士学位授权点,2007年成为上海市重点学科。本学科自始就把德国哲学和法国哲学立为研究重点,并于2003年开始主编、出版“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次年又启动了“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几年来,承蒙海内外学界朋友的鼎力相助,上述两套丛书共出版了50余种学术图书(均在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获得了良好的学术反响。

2007年,我们整合同济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和法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成立了国内唯一的“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稍后又与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合作,在研究院内设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从而初步形成了同济大学欧洲哲学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研究重点范围得以进一步扩展,涉及德国哲学、法国哲学、欧洲诗学(文艺)、欧洲基督教哲学等多个学科。为适应新的形势,我们随即把“德意志文化”和“法兰西文化”两个系列合并成一套丛书,并把它冠名为“同济·欧洲文化丛书”。自2014年起,该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众所周知,欧洲曾经是、现在重又是一个整体单位。中古基督教的欧洲原是一个统一的帝国,所谓“神圣罗马帝国”。文艺复兴前后,欧洲分出众多以民族语言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有大有小,有强有弱,也有早有晚(德国算是其中的一个特别迟发

的国家了),风风雨雨几个世纪间,完成了工业化—现代化过程。而到20世纪的后半叶,欧洲重新开始了政治经济上的一体化进程,1993年11月1日,“欧盟”正式成立。至少在名义上,又一个统一的欧洲诞生了——是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么?

马克思当年曾预判:要搞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至少得整个欧洲一起搞(但后来列宁同志单干了)。一个统一的欧洲显然也是哲人马克思的理想。而今天的欧盟似乎正在一步步实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虽然欧盟起步不久,内部存在种种差异、矛盾和问题,但在我看来,在今天以美国主义为主导的全球文明格局中,一个崇尚民主自由的欧洲,一个重视民生福利的欧洲,一个趋向稳重节制姿态的欧洲,是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价值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欧洲的存在,不仅具有地缘战略上的显赫意义,更可以具有某种文化上的示范和警示意义。

欧洲是“世界历史性的”欧洲。有鉴于此,我们当年创办了“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也正因此,我们今天要继续编辑出版“同济·欧洲文化丛书”,愿以同舟共济的精神,推进我国的欧洲文化研究事业。

孙周兴

2013年12月14日于沪上同济

目 录

- 第一章 海德格尔与基督教 / 1
- 第二章 海德格尔 1919 年的《哲学之观念与世界观问题》
讲课 / 63
- 第三章 海德格尔的《宗教现象学导论》 / 121
- 第四章 海德格尔论实在问题 / 165
- 第五章 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序论》对胡塞尔现象学的
内在批判 / 181
- 第六章 海德格尔“世界”概念的超越式意涵 / 213
- 第七章 海德格尔论动物与世界 / 235
- 第八章 《存在与时间》的“存在论”概念与传统形而上
学 / 255
- 第九章 海德格尔的“阐释”概念与文本解释 / 275
- 第十章 胡塞尔意向主义中的实质内容 / 315

第十一章 含义与充实行为 / 333

简称 / 361

德汉术语对照表 / 365

后记 / 367

同济·欧洲文化丛书书目 / 371

第一章 海德格尔与基督教

没有这神学的来源我永不会到达思想的道路。

——海德格尔(US: 96)

无论是多么强调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思想原创性的研究者,大概都不能无视海德格尔在思想上所受到的影响。李克尔特(Heinrich Rickert)的新康德主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诠释学、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这些当代哲学潮流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发展有所冲击,都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有一种对海德格尔影响由来更早、为时更久、也可能意义更为深远的精神力量,却相对被哲学研究者所忽视,尤以在汉语学界中为然。我所指的这种精神力量,就是基督教。^① 海德格尔在1935年7月1日致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书信中说:

我衷心感谢你的问候,这令我很高兴;因为我差不多完全孤独。有人对我说,你忙于一部尼采书(Nietzsche-Buch);在那部大作以后你身上还有如此奔流,令我感到高兴。我这

① 我以“基督教”翻译 Christentum,以“公教”翻译 Katholizismus,而以“新教”翻译 Protestantismus。

方面则可以说是一种费劲的摸索；在最近几个月我才重拾在1932至1933年冬季学期（休假）所中断的工作，但也只是轻描淡写。而除此以外，想要克服两根芒刺——面对出生的信仰（*Glauben der Herkunft*）和校长工作的失败——已经够我受了。^①

海德格尔“出生的信仰”就是罗马公教。海德格尔写这封信的时候，与他公开宣布脱离“公教体系”已经相距了十六年半。为什么相隔了这么长的时间，“出生的信仰”还使他如芒刺在背呢？而且，“出生的信仰”对他的意义，更似乎尤甚于刚刚才发生的“校长工作的失败”。他把“出生的信仰”排在“校长工作的失败”之前，这至少表示前者是他提笔的时候所首先想到的。而且，海德格尔表达他的精神痛苦的方式，亦典出他“出生的信仰”——出自保罗的《哥林多后书》。^②此外，为什么他把“出生的信仰”与“校长工作的失败”相提并论呢？这是否表示两者之间有某种程度的关系呢？

以上的问题，牵涉层面广泛，不可能在单单一篇论文里——

① 引自 Hugo Ott,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 seiner Biographie*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Verlag, 1992) (以下简称 MH), S. 42。以下对海德格尔生平叙述，主要参考这部作品；另参考 Rüdiger Safranski,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Frankfurt/Main: Fischer, 2001) (以下简称 MD) [中译本：《海德格尔传》靳希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Thomas Sheehan, “Heidegger’s *Lehrjahre*”, in John C. Sallis, Giuseppina Moneta and Jacques Taminiaux (ed.) *The Collegium Phaenomenologicum: The First Ten Years* (Dordrecht/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pp. 77 - 137 (以下简称 HL)；Thomas Sheehan, “Heidegger’s Early Years: Fragments for a Philosophical Biography”, in Thomas Sheehan (ed.) *Heidegger: The Man and the Thinker* (Chicago: Precedent, 1981), pp. 3 - 19 (以下简称 HEY)。

② 《哥林多后书》12:7-8：“又恐怕我因所得启示的超越，就过于高抬自己，所以有一根刺，就是撒旦的使者，加在我的肉体上，为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海德格尔在1920至1921年冬季学期的讲课中，对此有所讨论，见 GA60, S. 98。

讨论。我在这篇论文中,只打算限制在“出生的信仰”问题之内,探讨海德格尔早年生活中与基督教的关系,以及基督教对他前期思想的影响。这种探讨将是我们了解以上问题的必要基础。然而,即使在这一范围之内,我们于此也不能做细大无遗的全面调查,而只能满足于一些生平的路标和概念的指示。

一、公教家庭

海德格尔 1889 年 9 月 26 日出生于德国西南部公教传统根深蒂固的小镇梅斯基希(Meßkirch),双亲都来自信奉罗马公教的家族。海德格尔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手工业者,祖父是鞋匠,而父亲则是木桶工匠兼教堂司事(Mesner);母亲世代务农,家里从上一代开始拥有自己的农地。海德格尔一家五口,属于社会中下阶层,足供糊口,却家无余资。根据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的说法,这个阶层的公教民众,一般忠于教会,有地方主义、反普鲁士、反资本主义和反犹的倾向。^①

在海德格尔出生的时候,梅斯基希的公教徒分裂为两派,即:公教徒和旧公教徒。这件事情要追溯到 1870 年,是年第一次梵蒂冈会议(the first Vatican Council)通过“教皇无谬”(the infallibility of the pope)的教条以压制自由派(liberals)。欧洲多处的自由派公教徒拒不奉诏,毅然脱离罗马教廷,他们被称为“旧公教派”,以有别于追随教廷的“公教派”。两派不但在教义问题上有所分歧,在经济条件和思想取向上亦有明显的分别:人数较少的旧公教徒,多来自较富裕的中产阶级,思想上倾向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化和世俗化;人数较多的公教徒则多来自相对贫困的社会中下阶层,思想上比较传统和保守,反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

海德格尔的家乡梅斯基希即为德国西南部“旧公教运动”(alt-

^① Safranski, MD, S. 18.

katholische Bewegung)的主要据点。1871年德国统一,首相俾斯麦(Ott von Bismarck)随即发起所谓“文化斗争”(Kulturkampf),以减弱罗马教廷对德国的影响力,在施政上偏向旧公教派。梅斯基希的地方政府即要求公教派让旧公教派共同使用镇上的圣马丁教堂(St. -Martins-Kirche)。公教派很不满意此一安排,毅然迁出教堂。1875年,在毗邻地方比尤农(Beuron)的本笃会(Benedictine)修院修士的协助之下^①,公教徒将不远处的一所水果仓库加以改造,权充为教堂。就是在这所权充的教堂中,海德格尔的父亲在1887年开始成为教堂司事,而他的木桶作坊也位于其中的一角。后来海德格尔也是在这所教堂中受洗的,从出生到6岁为止,他的童年时光多在此渡过。

梅斯基希两派公教徒之间的斗争在世纪末开始慢慢消退。1895年旧公教徒正式将圣马丁教堂交回公教徒的手上。在交接仪式上,海德格尔无意中成为事件的要角。因为旧公教派的教堂司事不愿意将教堂的钥匙亲手交给他的对手,因此就随意将之塞给他对手的大儿子,也就是当时6岁大的海德格尔。在公教两派的文化斗争中长大的海德格尔,对此一斗争肯定有切身的感受和体会。在当时,海德格尔的父母属于反现代化的一派;而成长后的海德格尔的思想则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对现代性的批判。我们难道可以否认,“出生的信仰”对海德格尔不具有持久和决定性的影响?

二、公教援助

海德格尔的弟弟弗里茨(Fritz Heidegger)说:“在物质方面,我们的父母既不贫困也不富有。”^②他们家可能衣食不愁,但却不足以供孩子上高等学府。当时出身卑微的孩子,如果上进向学,

^① 这所修院是海德格尔常到之地。参见 Ott, MH, S. 46。

^② Ott, MH, S. 50。

他们可以求助的对象可能就只有基督教教会。但教会的同情之手也不是随便伸出的,教会的恩典有时也是有条件的:教会帮助低下阶层的聪明孩子上学,同时也是在为教会培养未来的神职人员。

天资敏颖的海德格尔,很早就被教会的“伯乐”看上了。梅斯基希教区的神父布兰德胡贝尔(Camillo Brandhuber),大概是海德格尔生平的第一位伯乐。海德格尔在1915年所写的“生平履历”(Lebenslauf)中说:“从1900年起我接受拉丁语的私人授课,使我在1903年入读在康斯坦兹(Konstanz)的文法学校(Gymnasium)的第三级低(Untertertia)。”^①1899年,10岁的海德格尔在梅斯基希镇内的人民学校(Volksschule)接受了四年基础教育之后,开始入读同样在镇内的市民学校(Bürgerschule)。^②他在次年就开始接受拉丁语授课,显然是为了转读文法学校作准备。因为市民学校中是没有拉丁语课程的,所以他需要私人授课。但以海德格尔的家境,他是绝不可能付得起钱请私人讲课的。根据奥特(Hugo Ott)的调查,此时为海德格尔讲授拉丁语的就是布兰德胡贝尔神父。很可能从海德格尔入读市民学校开始,布兰德胡贝尔神父即与海德格尔的父母商量,计划将他培育为公教的神职人员。^③因此布兰德胡贝尔神父主动免费为海德格尔讲授拉丁语,这样他才有可能入读文法学校,以进一步接受公教会为培育神职人

① Ott, MH, S. 85. 德国的文法学校(Gymnasium)包括九年的教育,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各包括三年。其班级次序是由最高年级,而不是我们所习惯的由最低年级开始数起。最低阶段(Unterstufe)由低数起包括:第六级(Sexta)、第五级(Quinta)和第四级(Quarta)。此后每一级又横跨两年。中间阶段(Mittelstufe)由低数起包括:第三级低(Untertertia)、第三级高(Obertertia)和第二级低(Untersekunda);最高阶段(Oberstufe)由低数起包括:第二级高(Obersekunda)、第一级低(Unterprima)和第一级高(Oberprima)。由于海德格尔在人民学校接受完四年基础教育之后,又已在市民学校念了四年,因此他转到文法学校后就直接入读中间阶段最低一级的第三级低。

②③ Sheehan, HL, pp. 82-83, p. 83.

员而设的教育。

梅斯基希镇内没有文法学校。1903年,14岁的海德格尔在市民学校度过了四年,并同时接受了三年拉丁语私人授课之后,离开他的故乡,顺利入读位于梅斯基希南面30里康斯坦兹的公立文法学校^①,并成为当地大主教教区辖下文法学校教会院舍(Erbischofliches Gymnasialkonvikt)^②——简称为“康拉德之家”(Konradihaus)——的宿生(Zögling)^③,正式迈出了神职旅程的第一步。不过,海德格尔的学业成绩足以进入文法学校,他家的经济条件却不足以支付他在康拉德之家的住宿费。康拉德之家当时的院长格约伯(Conrad Gröber)恰巧是海德格尔的同乡。格约伯可算是海德格尔第二位在公教会中的伯乐,他对海德格尔日后有相当重要的影响^④,其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由海德格尔晚年亲自讲述的,在1907年夏天格约伯送给他一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的博士论文《据亚里士多德论存在者的多重意义》(*Von der mannigfachen Bedeutung des Seienden nach Aristoteles*),从而

① 康斯坦兹的文法学校原来是一所耶稣会(Jesuit)学校,于1604年创立。但从1773年耶稣会受到教廷的压制以后,这所学校就成为一所由市政府营办的世俗学校。参见 Ott, MH, S. 52-53; Sheeham, HL, p. 84。海德格尔第一次进入耶稣会机构是在1909年,详见下文。

② 这所教会院舍在1864年由弗赖堡大主教创立,由于“文化斗争”的关系,在1874年被关闭,到1888年才重开。参见 Victor Farias, *Heidegger and Nazism*, ed. Joseph Margolis and Tom Rockmore, trans. Paul Burrell (French materials), Gabriel R. Ricci (German material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5; Safranski, MD, S. 25。但据舍恩(Sheehan)的说法,它在1884年就重开。参见 Sheehan, HL, p. 124 n. 25。

③ 德语 Zögling 有特殊的意义,不单纯是指学生或宿生,而是特指公教会教区辖下包括宗教训练院舍中的住宿生。参见 Ott, MH, S. 56。

④ 海德格尔在1915年的“生平履历”中说:“Entscheidenden geistigen Einfluß verdanke ich dem damaligen Rektor des Knabenkonvikts, dem jetzigen Stadtpfarrer Dr. Conrad Gröber in Konstanz.”引自 Ott, MH, S. 85。

开启了他进入哲学之门的故事。^① 此时就是格约伯出面与大主教教区在弗赖堡(Freiburg)的负责人交涉。原先希望免除海德格尔全部住宿费,却不获批准,最终只获减免。但余数海德格尔的父母仍无法独立支付,幸好再次得到布兰德胡贝尔神父伸出援手,替海德格尔从家乡梅斯基希当地的基金申请到一笔称为“韦斯助学金”(Weißsches Stipendium)的资助^②,才算凑合解决了住宿费的问题。不久以后,当海德格尔所接受的助学金金额增加到一年300 马克以后,他的双亲才完全不用再负担天赋过人的儿子的任何学费。^③ 对于那位无论在学业还是经济上都为海德格尔打开接受高等教育之门的布兰德胡贝尔神父,海德格尔在一生众多的回忆文章中却没有片言只字提及。如果没有奥特的调查,我们还不知道在海德格尔的学术之路上,曾经有这样一位重要人物。

家境寒微的海德格尔,在登入欧洲高等教育殿堂的同时,也开始了他对公教会的经济依赖,而这种依赖将维持一段很长的时间。通过教会所获得的助学金并不是全然无条件的,受助人将被期望以某种方式回馈教会,对教会的未来有所贡献。这就意味着,在经济上依赖教会援助才得以升学的海德格尔,在受资助的时期之内——如上所言,这将维持一段长时间——将有效忠于公教会的义务,或至少表面上必须如此。我们将会看到,海德格尔在这段期间也的确符合这种期望。

① 参见 FS, S. x; US, S. 92; BR, S. x; SD, S. 81。另参见 Ott, MH, S. 54; Sheehan, HEY, p. 4; Sheehan, HL, p. 86。但在 1915 年的“生平履历”中海德格尔却说,在文法学校的最后一年,把他更有意识地导入哲学问题的,首推文法学校教授 Widder 所讲的柏拉图课:“In der Oberprima waren es vor allem die Platostunden bei dem vor einigen Jahren verstorbenen Gymnasialprofessor Widder, die mich mehr bewußt, wenn auch noch mit theoretischer Strenge in philosophische Probleme einführten.” 引自 Ott, MH, S. 86。

② 此助学金以公教史学家和神学家韦斯(Johann Baptist Weiss)(1820—1899)神甫命名。参见 Sheehan, HL, pp. 124—125 n. 29。

③ 起初海德格尔的双亲还要为他掏出一年的 50 马克的住宿费。参见 Sheehan, HL, pp. 84—85。

1906年,在康斯坦兹的公立文法学校学习了三年以后,海德格尔转到弗赖堡的公立文法学校,即有名的伯尔托特文法学校(Bertholdgymnasium),并同时转到当地大主教教区辖下的文法学校教会院舍(erbischofliches Gymnasialkonvikt St. Georg)寄宿。^①弗赖堡的文法学校或许比康斯坦兹更好,但相信海德格尔转学主要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申请了一笔更为可观的助学金——“埃利内尔助学金”(Elinersches Stipendium)。此助学金的设立者埃利内尔(Christoph Eliner, 1538—1575)是一位公教神学家,在梅斯基希出生,因此梅斯基希的申请人占有优势。埃利内尔本人在弗赖堡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他设立的助学金的条件之一就是受助者必须入读弗赖堡的文法学校,并且之后在弗赖堡大学修读公教神学。海德格尔想获得这笔为数一年400马克的助学金,就必须转学到比康斯坦兹离家乡更远的弗赖堡。^②于是,17岁的海德格尔来到这座对他的将来意义重大的城市。而之后三年他在文法学校的学习(1906—1909),以及再之后两年他在弗赖堡大学神学系的研读(1909—1911),都依靠以修习神学为条件的埃利内尔助学金的资助。

1911年海德格尔自神学系退学以后,他就丧失了继续领取埃利内尔助学金的资格;同时他也搬出了教会院舍^③,支出当较以前更大。到1912年4月,海德格尔才获得另一笔资助,弗赖堡大学

① 这所教会院舍由于“文化斗争”在1874年被关闭,到1881年才重开,见 Sheehan, HL, p. 125 n. 33。

② 弗赖堡文法学校教会院舍的院长尚岑巴赫(Leonhard Schanzenbach)在为海德格尔所写的毕业生报告中说:“Martin Heidegger... trat vom Gymnasium und Konvikt in Konstanz in die hiesige Obersekunda ein, weil der Bezug eines Elinerschen Stipendiums den Wechsel der Anstalt verlangte.” 引自 Ott, MH, S. 59。

③ Sheehan, HL, p. 96: “By the fall of 1911, when he returned to Freiburg University, Heidegger had moved out of the theological seminary and into an apartment at #1 Hohenzollernstrasse on the northwest edge of the city.”

拨给他每年 400 马克的助学金。^① 但这笔资助,再加上海德格尔做私人教师的收入,显然仍不敷应用。在此期间,海德格尔当时最好的朋友拉斯洛夫斯基(Ernst Laslowski)四处奔走,到处为海德格尔寻求资助,后来终于从前者的公教学生社团旧朋友那里寻找到一点贷款。^② 拉斯洛夫斯基是海德格尔在 1911 年认识的朋友,当时在弗赖堡大学跟随哲学系历史学基督教讲座教授芬柯(Heinrich Finke)学习。他可能是海德格尔最早的忠实信徒、最早的“海德格尔派”(Heideggerian);他深信海德格尔的“伟大”,深信海德格尔就是公教哲学的未来。^③ 在海德格尔青年时代最失意、最低沉、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刻——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时刻不止一次出现——拉斯洛夫斯基总是不离不弃,不断鼓励海德格尔,为海德格尔出谋划策。拉斯洛夫斯基甚至可能“有一点爱上海德格尔”^④。在 1917 年 1 月,当他听到他亲爱的朋友将要结婚的消息后,“陷入了最严重的不安”,因为他“不想把他的马丁让给一位女人”^⑤。他马上写信给海德格尔,表示“我不能够为佩特里(Petri)小姐写给我的内容感到高兴”;他请求他的朋友谨慎行事,“等一下,直到我俩再在一起”^⑥。对于青年时代的这位忠实朋友,海德格尔在以后所写的回忆文字中也没有提及。我们得再次感谢奥特,他发掘出拉斯洛夫斯基致海德格尔的书信,让我们认识到海德格尔的这位亲密朋友,也让我们更加了解“彷徨少年时”的海德格尔。

① 这笔助学金称为“Grieshaber-Pino Stipendium”,海德格尔之后连续三年获取。参见 Sheehan, HL, p. 99, 132 n. 101。

②③⑤ Ott, MH, S. 75, S. 75, S. 99。

④ Safranski, MD, S. 59。

⑥ 拉斯洛夫斯基 1917 年 1 月 28 日致海德格尔的书信。引自 Alfred Denker, Hans-Helmuth Gander, Holger Zaborowski (hrsg.), *Heidegger und die Anfänge seines Denkens*, Heidegger-Jahrbuch 1 (Freiburg/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2004) (以下简称 HJ1), S. 54; 中译本:《海德格尔与其思想的开端》(靳希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 53 页。译文有改动。佩特里就是海德格尔的妻子,详见后文。